

# 論阮籍《詠懷》對抒情傳統時觀之再造

蕭 馳\*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 摘 要

本文在有關時間的思索乃阮籍「憂生之嗟」之基本視域這一論點基礎上，討論《詠懷詩》對抒情傳統時觀之開拓。文章以阮氏易學為起點，通過與屈賦時觀之比較，將其時觀的出發點概括為：阮氏已非一般地「歎逝」，而是「知懼」於宇宙時間中「質的變化」。由《易》各卦所代表的「特定時系」之「時義」觀念，既令阮氏肯認制約著個人生命的階段決定論，又使之堅持「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的立場，從而表現出對基於宿命信念的「現實原則」和道德理念的雙邊執取。由此，文章轉入對阮詩三類時相的討論：阮籍因藉《周易》時觀觀照其所處時代，對未來持一有限之悲觀論；然惟直面未來之無望，其作為抒情詩人，卻又超越了《周易》朝向未來之時觀，發現出生命價值在於由情愛所珍攝的當下心境；阮詩之援引古事，則體現了《周易》中情勢超越時間表象而進入原型的本質。文章總結阮籍為屈原之後再一次深刻地創造了「詩的時間」的詩人。即，阮籍超越了自及時的官能快樂去肯定生命片刻的傳統，而由自心境、特別是自情愛去珍攝生命片刻的意識提出了新的詩學觀念，并逗啓了郭象時觀。而由阮籍為克服純以古事為「象」而強調的「空間意象」，由其自易學而生的對於一次性生命時間與循環往復宇宙時間差比之敏感，中國詩歌產生出弔古傳統，即以歷史之維，賦當下即目的河山以更深的「空間」、更「立體的」時間。

**關鍵詞：**阮籍，《詠懷詩》，時觀，易學，抒情傳統

---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chxiaoc@nus.edu.sg。

## 一、引言

阮籍是詩史上一個值得重新評價的人物。百代詩話之祖的《詩品》，雖列其為上品，然在敘述建安之後五言詩的發展時，卻以「爾後陵遲衰微，迄于有晉」<sup>(註 1)</sup>一句，全然抹煞了其歷史地位。在清以前敘述詩史的文字中，他的名字雖多被提及，但自劉勰至許學夷，他都似乎只是正始這個詩史的低潮期裏一位值得提起的詩人而已。《滄浪詩話》的〈詩體〉卷中，他只被涵攝在「以時而論」的「正始體」下，卻在「以人而論」的段落中缺席。對他評價更低的是明人胡應麟的《詩藪》，謂：「阮公起建安後，獨得遺響，第文多質少，詞衍意狹。……其音響，漢與魏之間也；其語與格，則晉也。茲所以反不如魏歟！」<sup>(註 2)</sup>對阮籍評價較高的是清人王漁洋，在他看來，嗣宗在〈十九首〉後、江左諸人之前，堪與曹子建、左太沖、郭景純比肩。<sup>(註 3)</sup>

近世人評價阮詩，思路大致有二。一是著眼於五言詩的發展，他不再被忽略，而成為五言的開關之人。<sup>(註 4)</sup>二是自雜詩、詠懷、感遇這一嫡脈相傳的詩體去考察，<sup>(註 5)</sup>他顯然是自江文通、庾子山、陳伯玉、張子壽，至明人王船山一系的淵源。然阮氏對抒情傳統的貢獻應不限於此。吉川幸次郎論中國詩史，以阮籍《詠懷詩》為「中國詩歌裏格調最高的作品」。<sup>(註 6)</sup>侯思孟 (Donald Holzman) 則這樣描述阮籍在中國詩人中的卓犖之處：「他不再滿足於將自己看作離家的遊子，或被君主棄置的失望士子；他還是天地之間的一個孤獨者：他的鄉愁是真正形而上的。」<sup>(註 7)</sup>法國比較文化學者儒連 (François Jullien 又譯于連) 在說明與希臘詩

1. 見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頁 60。

2. 《詩藪》內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 2，頁 29。

3. 《滄浪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卷 1，頁 20。

4. 如胡適《白話文學史》稱他為「第一個用全力作五言詩的人；詩的體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詩的範圍到他方才擴充到無所不包的地位」（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 51；李維：《詩史》稱其《詠懷》為「五言之冠冕也」（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 41；臺靜農《中國文學史》稱其「五言詩到了阮籍的詠懷之作，為詩史展開了一新的道路。」（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頁 178。

5. 此方面近著作見胡大雷，《中古詩人抒情方式的演進》（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35-40。

6. 高橋和巳編，蔡靖泉等譯，《中國詩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頁 196。

7. *Poetry and Politics: The Life and Works of Juan Ch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45.

歌的「寓意」、「象徵」、「摹仿」均不侔的中國詩歌的「引喻」(allusive) 本質時，則以阮籍《詠懷詩》作為例證。(註8)所有這些出自比較的透視，都提示吾人：阮氏之於中國詩的重要性，應不限於自體式、詩體或題材去考量，而應進一步置於美學的、乃至文化的視野裏去討論。這正是本文論題所擬展開的方向。

本文不在內容／形式二分法、而在二者糾結一體的架構下討論問題，即是肯認二者在內在邏輯上的互相表達。(註9)以這樣的進路，又在視《詠懷》為於存在危機中叩問生命意義的認知下，本文選擇作為個體生命緣在(註10)之基本視域的時問為關注點。此一時間，依內容與形式互相表達的觀念，既是詩人生命中的問題，亦是詩歌藝術觀念的問題。本文首要的關注是：阮氏之學裏，其新的時觀究竟由何而生？

本文論證循如下順序：自《詠懷詩》之特徵出發，本文提出阮詩中時間問題的本質性。而探索此一問題，本文先以阮氏易學為起點，將《詠懷》與屈賦時觀之不同概括為對基於宿命信念的「現實原則」和道德理念的雙邊執取。以此為基點，本文對阮詩的三類時相展開討論，依次為：阮籍因藉《周易》時觀作時代觀照，對未來持一有限之悲觀論；惟因直面未來之無望，其作為抒情詩人，卻又超越了《周易》朝向未來之時觀，發現了生命價值在於由情愛所珍攝的當下心境；阮詩之援引古事入詩，則體現了《周易》中情勢超越時間表象而進入原型的本質。最後，本文將自兩個方面總結《詠懷詩》對抒情傳統時觀之再造及深遠影響。

## 二、現實原則與道德理念：阮籍悲情中的雙邊執取

蕭統謂阮籍《詠懷》乃種種「憂生之嗟」，(註11)沈德潛謂其中「反覆零亂，興

8. *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and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 trans. Sophie Hawke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 pp. 165-194.

9. 請參看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Twentieth-Century Dialectical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403.

10. 這是張祥龍對海德格 *dasein* 一詞的中譯，他以此說明個體與世界的相互纏結和發生。見其〈“Dasein”的含義與譯名—理解海德格《存在與時間》的線索〉，《從現象學到孔夫子》(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 69-93。

11. 《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 中冊，卷 23，頁 322。

寄無端，和愉哀怨，倏詭不羈」，<sup>(註 12)</sup>今有論者更以《詠懷》為「中國詩自口頭的公共表現到書寫的個人反省轉變之完成」。<sup>(註 13)</sup>然而，在此以「反覆零亂，興寄無端」書寫出的個人反省到的種種「憂生之嗟」中，是否有一中心題旨可尋？阮氏個人反省中的「憂生」，如果透過當今海德格存在現象論來觀照，即是魏晉險惡環境中，作為人之生存的「緣在」(dasein，亦譯為此在)源始的「牽掛」(Sorge)及其在世建構的「畏」(Angst)。人之生存本身意味著在過去某一時刻被沒有選擇地拋入世界、卻被未來所牽掛的一種展開。在此，「時間性綻露為本真的牽掛的意義」，綻露為「緣在的歷史性」。<sup>(註 14)</sup>此一時間，既非客觀的物理時間，亦非主觀的心理時間，而是由緣在生長出的「本真時間」。而「源始而本真的時間性的首要現象是將來」，<sup>(註 15)</sup>并由此引發出「已在」和「當前」，以及三者的相互纏結。在阮籍的《詠懷詩》中，據筆者統計，竟有五十首直接涉及了時間。對時間或時間性的思索應當構成了詩人種種「憂生之嗟」的基本視域。以海德格的「時間性」為透鏡，阮籍「憂生」中對時間的思索又有哪些特徵？

陳世驥曾斷言，屈原以《離騷》和《天問》「始創了詩的時間」：「紀元前四世紀在中國突然產生的時間的觀念，卻沒有哲學的前例也沒有宗教的論辯作為其背景，而是靈光突然一閃的詩的視覺。」<sup>(註 16)</sup>陳氏論屈原對時間的始創，可大致概括為兩點。首先，與孟的實證的泰然、莊的超越的安詳相比，屈的時間具有搖蕩心靈的主觀性，以人類亦以其自己為依歸：「哀朕時之不當」蘊含了中國思想上從未有過的個人化的主觀時間視域；其次，「時」在《離騷》中出現六次，皆作為實質名詞，有著流轉不停的命運感，而詩人以自決的姿態和面對失望的勇氣，堅守其在世界的存在，遂成為全詩悲劇性和英雄精神的主要體現。<sup>(註 17)</sup>

阮詩很受屈賦影響，也一定繼承了「屈子之心」對時間的敏感。侯思孟在《詠

12. 《說詩碎語》卷上，見《原詩·一瓢詩話·說詩碎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頁 201。

13. 見蕭馳，〈再論中國詩歌自口頭公共表達向書寫個人體驗的轉變〉，《淡江中文學報》，17 (2007.12)，頁 24-45。

14. 海德格著，陳嘉映、王慶節合譯、熊偉校，《存在與時間》(北京：三聯書店，2000)，頁 372、379。

15. 同上書，頁 375。

16. 〈論時：屈賦發微〉，古添洪譯，載《中國古典文學比較研究》(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7)，頁 59。

17. 同上書，頁 47-108。

懷》中讀出的詩人「困擾於時間的流逝」和「逃離政治世界中的衰老」(註 18)就有此一影響的痕跡。然而，在此之外，阮籍《詠懷》是否提出了新的觀念？侯氏謂阮籍「幾乎是在形而上的層次上，沉思著時間的意義本身，而並非正在經歷著的朝代變遷」。(註 19)但是，這樣的新觀念由何而來？對嗣後抒情傳統的發展又具何種意義？

前述陳世驥論屈賦時觀之大文，立足於屈賦與《詩經》、《論語》、《孟子》、《莊子》等先秦古籍中「時」字意義的對照。顯然是顧及時序的問題，(註 20)他沒有提及另一部對中國文化中時間觀念形成影響重大的著作——《易》之「十翼」。而因「十翼」，依方東美之說，才真正創造出儒家「時際人」的觀念：「無論其為個人生命之盡性發展，天地萬物自然生命之大化流行，社會組織之結構體系，價值生命之創造成就，乃至性體本身之臻於終極完滿等等——悉投注於時間之鑄模中，而一一貞定之，使依次呈現其真實存在。」(註 21)而對於魏晉玄學時代的阮籍，這卻是一個不可忽略的思想資源。

魏晉玄學號稱三玄，但正始八年以後，《易》成為三玄核心，玄學作品亦多以易學出之。(註 22)阮籍《詠懷》的寫作雖然可能不限於正始後期，但阮氏文化人格之形成，歷經此一玄風的洗禮，卻是不爭的事實。阮氏撰有〈通易論〉，其人「識密鑿亦洞」、「沈醉似埋照」，(註 23)平生行藏極能審時幾，知進退，深得於易道之用，所謂「極深而研幾也」。(註 24)史載：「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司馬昭初欲為司馬炎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註 25)魏封司馬昭為晉公，備禮九錫，昭固讓不受，公卿將校勸進，就阮籍求文，

18. *Poetry and Politics: The Life and Works of Juan Chi*, p. 149, 156.

19. *Ibid.*, p. 164.

20. 高亨以為《易傳》七種皆作於戰國時代，其中象傳、象傳、文言、繫辭作於魏襄王前（318B.C），而說卦、序卦、雜卦則成於魏襄之後，見其《周易大傳今注》（濟南：齊魯書社，1983），頁 8。朱伯崑以為彖成於戰國中期以後、孟子和荀子之間；象成於秦漢之際前的戰國後期；文言成於《呂氏春秋》之前；繫辭的下限可斷於戰國末年；說卦成於戰國後期；序卦成於漢初以前；雜卦則可能出於漢人之手，見其《易學哲學史》（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第 1 冊，頁 41-54。

21. 孫智燊譯，《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上冊，頁 216。

22. 詳見王葆琰，《正始玄學》（濟南：齊魯書社，1987），頁 181-182。

23. 顏延之，〈五君詠〉其一，遼欽立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中冊，頁 1235。

24. 《周易·繫辭上》，引自孔穎達，《周易正義》，《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上冊，頁 81。

25. 《晉書》卷 49 〈阮籍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 5 冊，頁 1360。